

流民與上海租界社會

• 馬陵合

一 租界社會對流民的吸附力

流民是流動人口的一種類型。在沒有嚴格的戶籍管理下，他們最基本的特點是缺乏穩定而良好的住所，職業具有較強的臨時性與不穩定性。對於城市來講，離村農民是其主流。他們源於「移民」，進入城市社會後因未被完全容納為其中一部分，遂成為城市社會的附屬階層。對於上海租界這個特殊的城市區域來說，流民是最低賤的階層，所包含的人群十分複雜，既有完全失業的乞丐、盜賊，又有處於半失業或隱性失業狀態下的各種苦力(如築路工、碼頭工人、人力車夫、手工業者、幫工等)和一些以女性為主的服務性人群(如女傭、娼妓)。他們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以離村農民為主要來源；二是工作生活具有流動性。

流民最基本的特點是缺乏穩定而良好的住所，職業具有較強的臨時性與不穩定性。對於城市來講，離村農民是其主流。

近代農村衰落，使農民離村進入租界的數量相當龐大，但因流民本身的流動性和缺乏完善戶籍登記制度，我們很難對其作出精確的統計，只能從一些側面稍稍展現他們的概況。1930-1936年，上海失業、半失業人口達60-70萬，佔總人口的20%^①；而租界人口則佔上海人口的60%左右，由此可以想見租界中失業人口之多。位於租界邊緣的棚戶區更能反映流民隊伍之龐大。1926年公共租界及毗連邊緣地帶即有棚戶居民1.4萬戶。根據大統路蕃瓜弄棚戶區202戶的調查資料，16-45歲的勞動力404人，其中142人失業，佔35.5%；184人拉人力車、三輪車或做流動小販餬口，佔46.04%；只有76人在工廠工作，佔18.81%^②。表1是根據零星資料進行的統計，流民的狀況由此可略見一斑。

研究流民形成的關鍵，在於上海租界社會對外來人口的吸附力。所謂吸附力，應是城市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承受力和附着力的合力。在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城市化水平並不能以租界內「康莊如砥，車馬交馳」的繁華外觀來涵蓋，而在於其城市特性和經濟功能，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農村勞動

表1 流民職業人口分布

| 職業 | 人數 | 統計年份 | 資料來源 |
|-------|---------|------|------|
| 人力車夫 | 100,000 | 1939 | a |
| 碼頭工人 | 50,000 | 20年代 | b |
| 妓女 | 7,791 | 1915 | c |
| 野鷄 | 37,140 | 1920 | d |
| 修鞋 | 2,000 | 1920 | e |
| 木工 | 23,400 | 1920 | e |
| 成衣業僱工 | 47,000 | 1920 | e |
| 理髮業僱工 | 24,000 | 1920 | e |

資料來源：

- (a) 蘇智民、陳麗菲：《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頁17。
 (b) 上海港史編寫組：《上海港史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276。
 (c) 平襟亞：〈舊上海的娼妓〉，《舊上海的煙賭娼》（上海：百家出版社，1988），頁159。這裏所統計的僅是繳納花捐的妓女。
 (d)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137。
 (e) 李次山編輯：〈上海勞動狀況〉，《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成衣業、理髮業的僱工主要來自外地，他們的住宿由僱主解決，而白天工作的地方往往便是夜晚休息的地方。

力引力場的大小。從上海租界本身的經濟發展來看，它的城市特性是典型依靠金融貿易帶動的消費型城市；它的經濟功能主要有兩個：一是房地產投資的寶地；二是溝通中外貿易的橋梁。所以，它給人的總體外觀印象總是居住建築與倉庫貨棧犬牙交錯。曾經有人說，上海租界是「大班的城市」、「買賣的城市」，「它是為這個目的而建立起來的，而買賣則始終是它的主要特徵」^③。

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說上海租界經濟沒有工業的成分。上海應該算作中國的工業中心，工業產值、工廠數幾近全國的一半，而且這些工廠絕大部分設在租界內。據1914年出版的《上海指南》所載，當時主要的350餘家工廠約有280餘家座落在租界內，佔總數的80%。此時，上海工人約有14-15萬人，租界內便佔了11-12萬人^④。這一時期是中國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些數據的典型意義是可信的。然而與同一時期的華人口口相比，這11-12萬工人僅佔總人數62萬的20%，即平均五個華人中只有一個能進工廠。同時，租界昂貴的地租嚴重地阻礙了工業發展。1909年，公共租界平均地價已達每畝4,603兩，1911年更上升至8,281兩^⑤。這給離此較遠的地區辦廠帶來了很大的便利。20年代以後，不論外商還是華商都把大量工廠設在地價較低的閘北、滬西地區，在那兒形成了新工業中心。所以，從整體上講，貿易金融是租界經濟的龍頭。1894、1933、1936年分別佔全國外貿總值的53.44%、53.87%、55.56%。1936年佔國內埠際貿易的75.2%^⑥。

這種經濟功能對勞動力的需求有特定的內涵。形象地講，繁華的城市外觀、發達的市場經濟與它對勞動力的需求無法相配，很難像工業發達地區一樣形成龐大的勞動力需求市場。同時，從金融貿易發展的角度來講，它一方面需

從上海租界本身的經濟發展來看，它的城市特性是典型依靠金融貿易帶動的消費型城市；它的經濟功能主要有兩個：一是房地產投資的寶地；二是溝通中外貿易的橋梁。所以，曾經有人說，上海租界是「大班的城市」、「買賣的城市」。

要為中外貿易服務的「倚徒華洋之間的買辦」和通事，他們基本上是來自廣東的買辦階層，而這些工作是一般外來農村人口所不能勝任的；另一方面則需要輔助性的勞動力，主要包括為中外商人服務的傭人、車夫、船夫和其他苦役，以及聚散流通商品原料的運輸工人。隨着中外貿易日趨頻繁，這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亦不斷擴張，它具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是非技術性，需要的是工人良好的體魄；二是需求量伸縮大，工作具有不穩定、流動的特點。

顯然，這種城市特性與經濟功能能否與數量巨大的外來人口相適應，是理解上海租界流民問題的基礎。這裏不妨以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兩種流民類型作一分析。從事這兩種職業的人有兩個特點：一是以外來人口為主；二是處於半失業狀態。

租界設置以後，外商沿租界黃埔江的岸線建造了許多碼頭，又在碼頭和租界內建造了倉庫堆棧。「碼頭銜接，工人如蟻，上下貨物之聲，『邪許』不絕」^⑦。早年在這裏謀食的碼頭工人多為本地的失業農民、漁民和船民，但隨着航運的增長、碼頭的擴建，到碼頭做工的逐漸以外來人口居多。據1918年的抽樣調查，85名碼頭工人中，來自本地的有49名，來自外地農村的則有33名，各佔總數的58%與39%。1937年，在被調查的271名工人中，來自本地的有10人，僅佔4%；而來自外地農村的有233人，佔86%。這些外來勞動力主要來自蘇北、安徽、廣東、寧波等地，他們每天半夜三更到碼頭領工票後才能進入碼頭工作，若拿不到工票就只能換個碼頭等候。一般情況下，他們一個月只能工作15-20天，少的甚至10天以下^⑧。

人力車是上海租界商業興盛、生活奢迷的一種標誌。1891年公共租界發放人力車執照32,681張，1901年已增至60,915張^⑨。20年代人力車夫已增至6-8萬

上海碼頭工人多來自蘇北、安徽、廣東、寧波等地，他們每天半夜三更到碼頭領工票後才能進入碼頭工作，若拿不到工票就只能換個碼頭等候。一般情況下，他們一個月只能工作15-20天，少的甚至10天以下。



人，1939年更達10萬人^⑩。這些人力車夫以「江北人為多，其次為山東人」。他們一般沒有自己的車，多是向車行租用。當時人力車夫的數量，已經超出正常的需求。1916年，公共租界白天在中區和北區行駛的人力車每平方英里不少於300輛，有人指出：「人力車的增多與需求無關，而是與另一個因素即人力車夫每天能賴以生活的最低生活費用有關。一個人力車夫只要每天能掙到這麼多的收入，他就會到人力車行去租車。」^⑪他們的生活和碼頭工人一樣痛苦不堪，每日只能維持兩餐，以玉米粉、麩皮麵、豆渣、菜皮充饑。他們住的不過是「租界邊緣的草屋或小屋」，或是「最上等的住小客棧裏牀鋪，出錢60文到百文，次等的睡在車子上面，再次等的睡在小菜場的地下」^⑫。

從上述兩種流民類型的職業狀況來說，他們的生活還不是完全無着，但仍不能將之歸入穩定的城市市民階層，頂多只能說他們是介乎失業游民與城市市民之間的流動性苦力階層。至於那些以乞討、偷竊、賣淫為生的外來農民，其流民色彩則更為濃烈。所以，流民問題產生的關鍵在於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差異。在勞動力供求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下，農民離村入城的浪潮產生了大量的失業、半失業勞動者。流民屬於勞動力市場中的停滯過剩人口，他們沒有固定的職業。因而，有人對此感嘆不已：「從農村擁到城市的勞動者，都成了可憐的失業之群。所以，農村勞動力胡亂的擁進城市，一方面，使農村中失卻生產的中堅份子——青年勞動力，而另一方面產生了大批的失業之群，這當然是人口變動的變態。」^⑬這種感嘆並沒有涵蓋問題的全部，只部分地反映了租界這個城市中的「特區」吸引農村人口的偏向。

這種偏向不僅是指勞動力市場的狹隘性和特殊性，同時也包含了租界社會所特有的環境對農村勞動力的附着力。這種附着力大概不在於租界的繁華眩目或其所提供的優渥工價，因為繁華外觀只對有錢華人有吸引力，勞動力供求比例失調亦不可能帶來厚利，其最大動因在於租界社會特殊的城市輻射力。

首先，租界較為安定的西方化社會環境和特有的城市經濟功能，為離村農民拓寬了在城市就業的門路。上海租界不僅有工業，更有發達的金融貿易；其市政建設、高等華洋人的生活消費、娛樂享受都居於全國城市之冠，由此形成的職業種類繁多、潛力很大。上海法華鄉農民流入租界後，即使進不了工廠，「男工另有種花園、築馬路、做小工、推小車。女工另有做花邊、結髮網、黏幣錠、幫忙工。生計日多，而專事耕織者日見其少矣」^⑭。租界工部局築路一項就吸引大量勞動力，20年代，其中所提供的穩定「長工」名額有600人，而臨時工的空缺則從幾百人到數千人不等。在租界內為富貴人家服務的女傭有2,000人左右^⑮，據載當時青浦農婦「貪上海傭價之昂，趨之若鶩，甚有棄家者」^⑯。職業的多樣性使離村農民無法對勞動力市場的承受力作出正確的判斷，致令流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應該是造就城市流民的最大動力。

其次，租界社會商業氣氛濃烈，投機冒險的機會很多，離村農民除了因利益驅動而遷移至此，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冒險精神。在上海這個商業城市裏，信息傳遞速度快、人際交往範圍廣、聚落開放程度高，人的創造性和潛力有充分發揮的機會。城市的競爭意識、創新意識、尋求機會的意識，對離村農民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他們抱着與其在鄉村貧困待斃，不如到城裏碰碰運氣的思想

租界為離村農民拓寬了在城市就業的門路，但職業的多樣性使離村農民無法對勞動力市場的承受力作出正確的判斷，致令流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應該是造就城市流民的最大動力。

在上海租界，有一半左右的碼頭工人、人力車夫是有家屬的。他們的妻子往往去當女傭幫補家用；他們的小孩子有本領的賣花生、甘蔗等吃食，得錢餬口。這是考察流民生存方式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法，促成了一股巨大的移民浪潮。川沙農民移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恃上海。夫以逼臨上海之故，人口有餘，則移之上海，職業無成，則求之上海」^{①7}。

上述兩個方面的結合，正是離村農民進入租界的外在因素。租界特殊的經濟功能，又使他們不易「回流」。一方面，流民的職業選擇有靈活性，難以形成完全的失業者，甚至連乞丐有時都可以找到臨時工作。到了炒茶季節，丐頭們「把這班乞丐找得來，做炒茶的生活。每家茶棧多的百人，少的三五十人」^{①8}。另一方面，舉家離村的比例不小。據1932年的調查，安徽南部、北部，江蘇南部、北部舉家離村的分別佔離村人口的46%、15%、31%、41%^{①9}。在上海租界，有一半左右的碼頭工人、人力車夫是有家屬的。由於這些人把城市作為自己生存繁衍的唯一選擇，所以生活即使困苦，他們仍要勉力支撐。人力車夫的妻子往往去當女傭幫補家用，他們的小孩子有本領的賣花生、甘蔗等吃食，得錢餬口。有點力氣的那怕未成年也要去拉車。這些就是流民隊伍日益壯大的另一個因素，也是考察流民生存方式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二 流民與租界社會的融合程度

流民在租界無疑是最下賤、最貧窮的階層。「上海之表面酣歌醉舞也，其裏面則啼饑號寒也」，形成了城市各階層截然對立的城市化外觀。然而，城市不同於單一的農業社會，它無疑是一個大熔爐。上海租界集文化、經濟、交通、消費、社交中心於一身，它特有的兼容性（主要源於遠離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軌道），為各階層的萌動交匯提供了一個相互交融的社會舞台。

在城市社會引力場的作用下，流民逐漸改變傳統單一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發揮自己的內在潛力以適應環境。正如美國城市社會學家帕克斯所指出的：「大城市之所以有吸引人口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大城市生活的環境中找到他舒適的角落和施展自己抱負的天地。」^{②0}可是，中國近代社會濃厚的封建色彩以及城鄉尖銳對立的基本形勢，決定了流民無法在租界內與社會主流融洽共存；但因着經濟利益的驅動，卻又使他們在極其矛盾的狀態下尋求與租界社會的融合，從而適應近代工商社會和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

流民與其他移民類型相比較，他們最基本的特點是主體素質低下。在工商業迅速發展的社會裏，他們從鄉村帶來的菲薄財力、低下的文化素質、缺乏進取的小農意識，使他們難以融入主流社會。面對生計壓迫、環境衝擊，他們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職業選擇、生活倫理模式。

流民最迫切關心的問題是他們的謀生之道。他們到租界後，喪失了傳統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以土地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也失去了穩定的財產、戶籍和職業，他們只有在自己的階層中尋求支持。農民只有迫切要求以次屬關係來強化自己的擇業手段，而這種次屬關係則是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流民在從事某一項苦力時，往往形成以同鄉關係為紐帶的群體，這就是上海租界流民社會中的「幫」。這種「幫」與黑社會中的「幫」有一定的淵源關係，如人力車夫90%屬於青

幫，但兩者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說，某種行業的「幫」是自發形成的，沒有嚴密的組織以及幫規，只是以「親不親故鄉人」的傳統觀念來加強流民之間的協作，以謀求在新環境中的精神依托和相對的職業穩定。他們基本上不以犯罪為職業。表2羅列了一些流民職業中的幫別：

表2 流民職業中的幫別

| 行業 | 主要幫別 |
|------|-----------------|
| 碼頭工人 | 蘇北幫、寧波幫、湖北幫、廣東幫 |
| 人力車夫 | 蘇北幫、山東幫 |
| 縫窮婆 | 蘇北幫 |
| 耍把戲 | 山東幫 |
| 女傭 | 揚州幫、蘇州幫、安徽幫 |
| 成衣業 | 寧波幫、常州幫 |
| 理髮業 | 揚州幫、鎮江幫、湖北幫 |
| 妓女 | 浙江幫、廣東幫、江蘇幫 |

「幫」的形式主要突出職業的地域色彩。非技術工人集中的行業大都採用包工制，僱主僱「幫」的頭目為工頭，工頭則以同鄉關係招僱工人，自成一系。這在碼頭工人中最為突出。各種不同工種分別由各「幫」把持，「肩運扛運大部分屬蘇北幫和

湖北幫，輪幫多數是廣東幫，而堆幫則以寧波幫為主」^②。

形式上，「幫」的封建色彩仍十分明顯。首先，它雖然突破了以家庭和土地為核心的經濟形式，但卻陷入另一種依附關係。如碼頭工人與工頭之間存在着一種明顯的依附關係。工頭不僅負責安排工人的工作，更抽取他們部分收入為基金，用以接濟因病、因故不能工作的工人，扶助傷殘，安葬死者。其次，「幫」亦具有明顯的排他性封建行會色彩，例如當時租界中流動性的木工約有23,000人，「他們各作，又有各作的小團體，多少都有一點行規。凡不入行的，總不許在上海工作」^②。但這些「幫」無疑地迎合這樣的現實：「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起作用的是非個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機能而不是地位或特定關係的機能。」^②城市的生產活動比小農經營進步之處在於其嚴密的人員組織，它需要集體意識。「幫」的基本團體意識是鄉土觀念，但在租界這樣一個多質的社會裏，鄉土觀念就衍化為互通信息、密切鄉誼、介紹職業、濟難互助，這對組織城市中可靠的勞動力、穩定社會秩序不無意義。所以，「幫」的封建性外觀與城市近代化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反映了農民在角色轉換中的一個過渡形態。「幫」恰好不自覺地加強了流民的組織性，使他們逐漸擺脫農民身分，而漸成真正意義的工人階級。

此外，在流民階層裏，出於互助目的還有職業介紹以及為流民服務的行業，這又為流民提供更大的職業選擇。據統計，20年代租界裏有2,000家上下的「薦頭店」，它們大都為農村婦女介紹家庭職業。隨着流民階層的壯大，為之服務的一些行業應運而生。如縫窮婆，她們服務的對象是工人、伙計、學徒，給他們縫襪底、補衣洞。其他還有修鞋、流動點心攤販等。這些職業不僅加強流民階層的適應能力，而且也是對單一鄉村耕織生產方式的突破，開始了階層內部的社會分工。

上海租界流民社會中的「幫」是自發形成的，沒有嚴密的組織以及幫規，只是以「親不親故鄉人」的傳統觀念來加強流民之間的協作，以謀求在新環境中的精神依托和相對的職業穩定。

二十世紀初，租界華人的女性人口中竟有12.5%是娼妓。妓女中也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書寓、長三等都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她們公然出現社交場合，成為時髦的先導。當時所謂的「開花榜」，是市民生活中的樂趣和時髦。

謀求安身之道應是流民與租界社會融合的基礎，但在租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社會裏，流民耳濡目染、親身體驗，他們傳統的倫理道德、生活方式開始受到衝擊，傳統的儒家教化倫理在他們心中趨於淡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趨利、實用為特性的倫理觀。西方社會的直接輻射和廣泛的商業原則正在改變和替代傳統的是非觀、擇業觀，樸實無華的田野村夫形象不見了。上海租界的超常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了這種轉變。租界中與流民有關的娼妓業的興盛便是一個見證。

上海被譽為「東方花都」，「十里洋場，釵光鬢影，幾如過江之鯽」。租界初開時，租界當局竟以開招稅源為由公然應允妓院營業，開徵「營業稅」，捕房裏特設管理妓女的「花捐班」。1906年前，花捐一直是租界當局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1865年法租界當局的預算收入為103,000兩，其中花捐營業稅收入為48,000兩，佔總收入的46.4%^②。加之西方妓女所帶來的影響，上海妓女賣淫日趨公開化。1864年，上海兩個租界共有1萬戶華人，其中688戶為妓館。到二十世紀初年，租界華人的女性人口中竟有12.5%是娼妓^③。然而，妓女中也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書寓、長三等都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她們公然出現社交場合，成為時髦的先導，很難歸入流民階層。只有低級妓女諸如花煙間妓女、釘棚妓女、野雞等可以歸入流民一類。她們充當妓女的原因，主要是農村破產、盲目流入城中，為生活所迫而操起皮肉生意。據1915年的上海《中華新報》載：租界的下等妓女主要來自蘇州、揚州的農村，她們大都當「野雞上青連閣，或做馬路天使拉客」，而她們的服務對象中不少是流民。「花煙間一開，則肩挑負販者誤矣！吸煙一盒，不過百錢，抹胸捋肚，無所不為，若輩各租界皆有，惟十六浦為麀團之所。……鄉民偶爾至此，稍為顧視，即拖入洞中，腰纏立罄。嘗見東洋車夫（為此）捉襟見肘，嗟乎。」^④

流民型的妓女及其與流民的交往，似乎表明傳統美德在流民與租界社會融合的過程中逐漸崩解。娼妓業的泛濫無疑對社會規範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20年代，中國社會學家易家鉞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城市人口空前的集中，造成了與中國農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環境。這種環境只是功利主義與墮落的中心，「城市是罪惡的代表」。這種「缺德的總和」，便是近代文明的全體^⑤。這種觀點代表了部分中國學者對西方型城市化所帶來的道德淪喪的一種憂慮，也確實道出了城市環境如何影響離村農民的倫理觀，但這無助於了解流民的生活實況。流民與娼妓業的關係，反映了西方式的商業、趨利原則對他們在職業選擇和生產方式上的「扭曲」。妓女在租界社會並沒有因本身的職業而受到大眾排斥，她們可以按照一般市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當時所謂的「開花榜」，是市民生活中的樂趣和時髦。但流民淪為妓女，畢竟不是城市市民生活倫理中的自然表現，它的根本出發點仍是為了謀生，賣淫不過是她們滯留城市的一種職業選擇。據調查，江蘇省金壇縣王母觀村離村農婦入城，「其職業可憐的居多」^⑥。此外，不少農村婦女是被人口販子賣入租界，當時俗稱「開條子」。20-30年代，上海有兩個最大的販賣婦女集團，即公共租界的尤阿根集團和法租界的任文楨集團，他們基本上以招工作為拐騙的手段。因此，娼妓只是農村婦女融入租界社會的非常態形式。

至於流民本身涉足嫖娼，主要的原因似乎是生活方式的變化，但這與租界社會中流行的爭趨奢華之風有多大的關連，倒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很明顯的，流民這種享樂方式很難與富人們的奢華淫佚相提並論，因為這種「怪異不循理性之現象」與流民低下的經濟地位難以相符。這裏至少應該考慮到流民心理變化的層面，即是在租界奢華風氣的影響下，他們從羨慕轉而模仿。這種模仿並不單純是追求奢靡、虛擲錢財，實際上也包含了他們對生活困苦的一種發泄，尤其是單身流民，尋歡作樂或許可以減緩生存的壓力和彌補精神上的失落。池志澂在〈滬遊夢影錄〉中對此作了直接的描述：「人之沉迷而不返者不知凡幾……蕩檢踰閒，傾財致命，問之其人，而其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而入其中者，或以情，或以憤，或以激，或以憐，則雖卑瑣闖茸之夫，未有不慷慨毫招以自喜。」時人的記述應該更能客觀反映這一心理現象。

綜上而觀，流民在生存方式和生活倫理的變化表明這樣的事實：他們雖然已經開始拋棄鄉村的小農經濟模式和傳統的倫理道德，但他們只能借用某些天然的形式生存，用扭曲的擇業手段安身，用消極的心理態勢去抗爭。所以，流民從未溶入租界社會，而始終是主流社會的一個次生群落與衍生物。流民不可能完全轉化成城市社會中新型的市民階層，同時也不可能完全保存鄉村社會中的田園氣息。租界無疑是個多元異質社會，但它的殖民地性質不可能讓聚集於此的移民都享受到自由、平等、民主的機會，實際上它像中國農村一樣，形成了「從屬」和「支配」性的層次結構。這是考察流民與租界社會融合程度的基礎。

流民從未溶入租界社會，而始終是主流社會的一個次生群落與衍生物。流民不可能轉化成城市中新型的市民階層，同時也不可能保存鄉村社會中的田園氣息。

三 流民：一個影響中國城市近代化的因素

租界社會的流民問題，實質上是中國近代人口城市化的一個典型。它的主要癥結在於城市的拉力顯然小於農村的推力，造成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然而，這並不能涵蓋流民與城市化的全部關係。我們若全面考察，流民問題至少體現了中國近代城市化道路上的幾個問題。

第一，流民是城市化的原動力之一。從上海租界來說，城市化有很大的移植成分，但本質上仍是一個變傳統落後的鄉村社會為現代先進的城市社會的自然歷史過程。這種轉化包括了由城市經濟、社會、文化等等要素所產生的巨大吸引力，使鄉村的勞動力向城市集中。流民實際上正是這種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流民因其鄉土文化背景和大體相似的職業流動性、低下的生活水準，長期以鄉下人的形象在上海租界社會中出現，這樣一個群體好像都市裏的村莊。然而，流民無疑又是租界城市化迅速發展的創造者之一，他們以自己的辛勞和耐苦去流通商品、修路建樓、建立城市生活，而且也衝破傳統農業社會的束縛，以求適應近代化的城市社會。

第二，非工業化的城市化道路，使以人口壓力為主要特徵的城市病過早出現。上海租界以金融貿易為其經濟支柱，遏止了工業的發展，但工業化是形成城市強大拉力的必要基礎。唯此，才能提高農村生產率，減少農村人口，增加城市人口，促進城市體系完善。表面上，上海租界的城市化進程迅速、市面繁

榮、經濟發達、人口大增，但與之相伴的便是在城市中過早地形成滯留人口。城鄉差別拉大加上農村人口大量流入，使人口壓力一開始就成為不治之症。上海租界中黑社會猖獗，與此不無相關，使上海租界在城市化道路上付出了極大代價。

第三，在租界這個特殊的社會裏，傳統的重義輕利思想受到近代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衝擊。這種轉變的影響，可見於流民在職業選擇、群體意識、生活倫理等方面已同單純依附土地的農民不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因為流民的社會地位低下和生活窘迫，致令他們在身分轉化過程中發生扭曲和倒退：鄉土觀念實際上並不能真正保護他們，相反只會束縛他們的手腳，阻斷他們與社會的融合。封建行幫又使他們陷入另一種封建依附關係。娼妓泛濫部分地反映其主體素質低下、缺乏競爭意識。

就整個租界社會來說，在充分西方化的背後仍有種種封建性的因素，因為它的成員絕大部分是華人，它的背後是廣袤的小農經濟海洋。這不單單是流民本身的問題，而且也是這種缺乏基礎、移植式城市化道路的悲哀。

註釋

- ①②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編：《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頁49；47。
- ③ [英]霍塞(Ernest O. Hauser)著，紀明譯：《出賣的上海灘》（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193。
- ④⑥⑧ 上海市歷史學會：《上海史研究》二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頁123；47；131。
- ⑤ [美]卜航濟(F.L. Hawks Pott)著，岑德彰譯：《上海租界略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28），頁228。
- ⑦⑬⑭⑰ 黃葦：《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177；336；336；338。
- ⑧⑳ 上海港史編寫組：《上海港史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275；276。
- ⑨⑪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頁74；218。
- ⑩ 《上海市年鑒》（1937年），頁26。
- ⑫⑮⑲⑳ 李次山編輯：〈上海勞動狀況〉，《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
- ⑬ 金輪海：《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37），頁342。
- ⑰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北京：三聯書店，1958），頁889。
- ⑱ 轉引自高珮義：《中外城市化比較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頁149。
- ⑳ [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賴蕭爾(Edwin O. Reischauer)著，陳仲丹等譯：《中國：傳統與變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頁78。
- ㉑ [英]馬士(Hosea Ballou 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2卷（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130。
- ㉒ 池志澂：〈滬遊夢影錄〉，《檔案與歷史》，1989年第1期。
- ㉓ 《民鐸》，第4卷，第5號。
- ㉔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北京：三聯書店，1958），頁647。

馬陵合 1989年畢業於廈門大學，1992年獲南開大學碩士，現為安徽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